

清朝与准噶尔汗国关系再探讨*

锋 晖**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乌鲁木齐 830000)

[内容提要] 对于准噶尔汗国的研究,今日学界多沿用满洲统治者的视角,使清准关系中诸多研究问题难以深入。本文自中国历史“大一统”角度,梳理准噶尔汗国历史沿革,解析清准双方关系实质,阐述清朝征服准噶尔汗国的战略目标、领域、布局,揭示其对清朝西北驻防格局的影响。

[关键词] 清朝 准噶尔 八旗驻防

[中图分类号] K2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8) 01-0015-07

准噶尔汗国与清朝的关系,若以 1640 年蒙古塔爾巴哈台会盟为起点,以 1762 年伊犁将军府设立为终点,前后跨时 122 年,历史影响深远。今日对清准关系的研究,诸多问题难以深入,其症结在于多沿用满洲视角、清朝立场,并将该立场视角与中国历史“大一统”理论相等同,使得对二者战略目标,双方斗争实质、矛盾涉及领域等研究,深入不足。重新自“大一统”角度审视清朝与准噶尔关系,对解析清代新疆史、西北史沿革甚有裨益。

一、准噶尔汗国的政权性质

准噶尔,系漠西蒙古一部,因统辖四卫拉特,遂泛称准噶尔汗国、卫拉特蒙古、厄鲁特蒙古等,其源始见《蒙古秘史》,称 oyired,汉籍称斡亦剌惕、斡亦剌等,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曾与弘吉刺、塔塔儿、乃蛮等部联合,袭击铁木真,后斡亦剌惕忽秃合别乞率部迎降,被封领地,拓展属民,逐步形成“四卫拉特”,并随蒙古大军西征,其部散布天山南北及中亚各地,于蒙古政权博弈中地位突出,成蒙古“黄金家族”笼络重点,婚配频繁,关系密切。明朝,汉籍称斡亦剌惕为瓦剌,绰罗斯部为四卫拉特统帅,于脱欢、也先时期,与东蒙古争夺霸,统一蒙古高原,统辖中亚至朝鲜广大区域,于“土木之役”中俘获明英宗,实现全盛。也先被害后,汗国随即割据分裂,也先次子斡失帖木儿重建绰罗斯政权,牙帐设于漠北扎卜旱河流域,驻绰罗斯部主力,居诸卫拉特核心,故称“厄鲁特”,汉义“魁首之部”,意为“大瓦剌”,居于哈密

* 1. 中国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锡伯语(满语)语料库建设与研究(编号 15ZDB110);2. 中国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心态研究》(编号 15BMZ023)。

** [作者简介] 锋晖(1977—),男(锡伯族),吉林师范大学满语文专业博士研究生,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

的属部称“小瓦剌”，为斡失帖木儿之子所辖。十六世纪初，大瓦剌随哈密王阿黑麻里西征中亚，留居故地余部重组四卫拉特，亦将魁首称“厄鲁特”。十六世纪中后期，蒙古各部纷争中，卫拉特屡遭劫东蒙古侵袭，土默特部多次袭击卫拉特驻地，迫使绰罗斯部迁徙。鄂尔多斯部征讨卫拉特，深入额尔齐斯河，掳掠卫拉特。喀尔喀诸部也曾多次发起进攻，卫拉特几经激战，一度失地萎缩。十七世纪初，卫拉特各部整合实力，重新崛起，击败喀尔喀部。土尔扈特部向西迁徙，一路征服鞑靼诸部，占据乌拉尔河至伏尔加河等区域；和硕特部南下，击败绰克图台吉，并进军西藏，控制青藏高原；对于中亚哈萨克、布鲁特，卫拉特诸部攻伐不断，加强扩张；对于沙俄的蚕食，准噶尔于亚梅什湖一战中全歼该处俄军，一度遏制沙俄渗透，卫拉特地域东起杭爱山西，西至中亚、顿河流域，北起额尔齐斯河，南至青藏。准噶尔部居四卫拉特核心。

明末，满洲崛起，后金建立，漠南蒙古纷纷顺服满洲，漠北蒙古也逐步受控，加之沙俄于西伯利亚扩张，占据喀尔喀所辖巴尔浑等地，卫拉特深感威胁，于格鲁派促成下，喀尔喀与卫拉特聚塔尔巴哈台会盟，订立《卫拉特法典》，规定准喀二部秩序，确立共同御敌职责，大力推崇黄教，实现政治势力的联合。十七世纪中叶，准噶尔内讧重起，僧格被害，其弟噶尔丹率其旧部平叛，以“温萨活佛”身份及达赖喇嘛的支持，迅速继位为准部首领，经数年征讨，结束政治割据，完成卫拉特各部统一，独揽大权，建立“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建军政、司法体系，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征服周边“萨马拉罕、布哈尔、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思哈尔、赛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①，被清朝视为“战斗之国”，成为欧亚大陆中介于沙俄、清朝之间的强大游牧政权。

纵览准噶尔汗国历史，可见准噶尔汗国政权性质与政治目标：

首先，就准噶尔的政权性质而言，与满洲（清朝）政权二者并不统属，准噶尔汗国历史远早于满洲政权，其既未归附于清朝，亦未臣服于沙俄，将其抗清定性为叛清，实为满洲统治者视角，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准噶尔汗国统一中亚及蒙古区域，与满洲政权统一东北及内地直省，二者性质相同，与三国两晋、五代十国时期各地方政权性质相同，需客观看待二者统一中国历程中的关系。所谓准噶尔的分裂，实质为满洲视角及其正统论的产物，此“成王败寇”的观点非史学视角，故需客观看待准噶尔统一蒙古及西域的历史功绩。

其次，就准噶尔汗国的政治目标而言，准噶尔的崛起，其初统一天山北路卫拉特诸部，再而征服回疆，实现天山南北的统一，旋征服哈萨克、布鲁特等诸部，实现中亚区域的统一，最后出兵漠北，拟统一喀尔喀诸部，实现自中亚区域至蒙古草原的统一，合围青藏教区，构建一个蒙藏统一体，其汗国历程实为统一蒙古、统一中国之历程。噶尔丹后，准噶尔继任者其政治目标虽未有详细记载，但与塔尔巴哈台会盟、《卫拉特法典》的宗旨基本一致。

二、准噶尔汗国对清朝的威胁

清朝与准噶尔的矛盾，其历时之长，地域之广，领域之多，可谓空前。

就斗争跨时而言，自1640年蒙古塔尔巴哈台会盟，达成联合抗清意向，至1762年伊犁将军府设立，清朝确立对准噶尔故地的统治，先后122年，时值清朝康熙乾隆盛世，三朝杰出君王以举国之力抵御准噶尔威胁。崇德五年（1640年），准噶尔与喀尔喀各部会盟，联手抗清；康熙年间，清准因喀尔喀问题，双方两度大战，康熙三次亲征，用兵七年使灭噶尔丹大军；雍正时期，清准因青藏问题再次交恶，策妄阿喇布坦欲控黄教势力，清廷实施“驱准保藏”策略，噶尔丹策零又于喀尔喀再起战事，几经交战，击退准军，和谈划界；乾隆朝，清廷以准部内讧，实施“以准击准”，最终征服准噶尔，前后跨逾百年，远甚三藩、台湾、雅克萨、金川等战事，其斗争跨时也可堪称之最。

就斗争地域而言，清朝为防御准噶尔，构建军事体系，自东北三省驻防，至北部漠北、漠南蒙古诸部，

^① 《清圣祖实录》卷183，页964—965，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中部自甘肃庄浪、凉州,延伸至吐鲁番、哈密回部一域,南路涵盖西藏、青海藏区,其驻防区域可称满洲之“万里长城”,地域之广堪称清代兵防之最。

就斗争领域而言,清朝为实现“以蒙制蒙”,扼制准噶尔,以八旗制、盟旗制纳漠南、漠北蒙古诸部于满洲左右,强化满蒙联盟;为整合回部之力,笼络哈密、吐鲁番元裔回部,设置札萨克,对其头目封官赐爵,对其部众编旗设佐;为笼络藏区蒙藏教民之心,推崇黄教,护送达赖坐床,设置驻藏大臣,隔离准噶尔;为实施经济制裁,设置八旗驻防于周边,把守关隘,控制贸易;为实现战略大包围,以外交手段联络沙俄、土尔扈特、哈萨克、布鲁特等,独立准噶尔;为分化准噶尔汗国,实现“以准击准”之策,封赏优抚准部投清降众,并以其为两路南北两路先锋反击,师行数千里无一抵抗者,彻底瓦解准噶尔汗国。清准斗争可谓涉及政治联盟、军事征服、经济封锁、宗教斗争、外交博弈等诸多方面,斗争领域之繁堪称之最。

就斗争性质而言,双方矛盾不同于平定三藩、台湾、沙俄等问题。首先,蒙古的统一,既有蒙古诸部众望所归的成分,也是西藏格鲁派宗教扩张计划的有机组成,使双方斗争中政治势力、军事力量、宗教派别多重因素紧密交织,错综复杂;其次,双方的矛盾缘起为蒙古的统一,清朝对准的征服、统一过程,亦对蒙古诸部实现分治的过程,其间八旗驻防由东北向西北的不断拓展,其结果是准噶尔属地尽数划入清朝,蒙古诸部全部控辖于满洲,清代中国版图遂完成定型;其三,准噶尔汗国为介于清朝、沙俄间一强大政权,控制范围辽阔,军事实力强大,准噶尔汗国与清朝同为少数民族政权,于明朝政权灭亡前后,前者自中亚向东展开统一,后者自东北向南展开统一,二者矛盾核心为中国版图与蒙古部众的统一问题,而非分裂、割据、侵犯的性质。

准噶尔汗国为清朝一大威胁,其政权的存在与覆灭,对清朝八旗驻防格局影响巨大。

三、清朝征服准噶尔的战略目标

1644年清朝入关,其战略目标在中原内地,消灭南明政权及反清势力,构建直省八旗驻防体系,实现对直省的直接控辖,而其政治基础之一是满蒙联盟,以联盟的巩固实现战略后方的稳定。对于蒙古诸部,满洲对追随者编入蒙古八旗,视为一体;对臣服者纳入盟旗,分封札萨克;对反叛者纳入总管旗,严加控制;对降而复叛、叛服不定者则举兵剿杀,其最终目的即为掌控蒙古诸部,巩固政权统治,其核心不在经济利益的获得,亦不在族众属地的直辖,而在满洲统治下满蒙联盟的巩固,蒙古部众对满洲的臣服恭顺,对蒙策略以消除政权威胁为宗旨,在处理准噶尔问题上尤为明显。

就清朝征服准部的战略目标而言。清朝入关初,清准关系尚为缓和,清朝并未对其设立八旗驻防,亦未采取军事征伐,“三藩之乱”时双方贸易频繁,互为利益往来。其后,噶尔丹欲统一蒙古,围绕喀尔喀归属,清准噶尔几度大战,历经康雍乾三朝,先后六十余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利用准部内讧,实施“以准击准”,初平准噶尔。是时,就属地管辖问题,乾隆帝谕“将军大臣等暂留驻扎,亦因准噶尔地方初定,现有应办事宜,俟一二年后,诸事俱定,即行撤回”^①,可见清廷对准噶尔属地未有直辖之心,亦无灭绝准噶尔部众之意,对于征准大军未做驻防安排,消灭准噶尔达瓦齐政权后,即刻撤返全部官兵。就准噶尔部众管理问题,乾隆晓谕“将彼处各台吉酌量劳绩及所属人数众寡,分别加恩,封为汗、贝勒、贝子、公等爵,虽各项爵秩,视汗自有等差,其为办理各该旗事务,任职维均,至本部落各札萨克等事务,即不归其统辖,向来喀尔喀内扎萨克等体制皆然,朕视准噶尔众台吉,与喀尔喀诸部落无异,凡事俱一体办理,四卫拉特台吉,亦应照喀尔喀每部落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遇有应奏事件,即报明驻扎大臣转奏,至大臣等回京后即著报部转奏”^②。

清廷对准部降众拟仿喀尔喀部札萨克制善后,分封卫拉特四部头目,以盟旗制实现族众的管理,随

① 《清高宗实录》卷490,页150—151,乾隆二十年六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② 《清高宗实录》卷490,页150—151,乾隆二十年六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即清军全线撤军,仅留五百官兵于伊犁。但其后卫拉特降众,响应阿睦尔撒纳之乱纷纷反清,盟旗分封宣告破灭,清廷亦惊亦怒,遂纵兵剿杀余众。纵览清朝对准政策,无论和谈与征伐,无论分封与剿杀,无论撤兵与驻防,清廷初衷始终围绕一核心,即准噶尔之顺从臣服,消除清朝政权之威胁。

四、清朝对准噶尔的战略包围

清朝应对准噶尔的威胁涉及三大区域:北部区域(漠南和漠北蒙古区域)、中部区域(甘肃至新疆东部区域)、南部区域(青海和西藏区域)。三大区域各有特色,战略目标、斗争方式不尽相同,双方均拟以此实现战略包围,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驻防体系也由三大区域逐步形成。同时,双方为取得主动,均采取外交手段,联络俄罗斯、哈萨克、布鲁特等,清朝亦联络土尔扈特等,欲实现战略合围。

1. 北部区域

清朝北部防御体系大致自呼伦贝尔、柳条边,沿蒙古草原、长城沿线,延伸至阿勒泰,对外防御俄罗斯,对内以准噶尔为主要防御对象,兼有其他蒙古诸部,以北京为重心,双方以漠南、漠北蒙古诸部的归属最为焦点。

北部防御体系南段,为原明朝九边,清朝驻兵热河、察哈尔、绥远城三处,使热河区域之承德、喀喇和屯、桦榆沟、木兰围场,及察哈尔驻防的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与绥远城东西连为一线,将蒙古草原及中原内地分割控制。康熙帝又将归降之喀尔喀、厄鲁特编入察哈尔,制衡其间,巩固防线;其东段,含柳条边西界、伯都纳、呼伦贝尔驻防等。柳条边以西为蒙古科尔沁游牧地,边门设兵把守,隔离满汉与蒙古。柳条边北上设伯都纳驻防,西控蒙古边界。伯都纳以北设置呼伦贝尔驻防,位处蒙古、沙俄、黑龙江三界游牧地,借以遥控喀尔喀。康熙三年(1671年),清廷于盛京设置将军,令其输送兵力,并逐步强化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编库雅拉、巴尔虎等部众为“新满洲”,编锡伯、卦尔察等部众入八旗,大规模徙民编旗,雍正朝东北全境八旗兵达26750名,其中迁来诸部佐领180个,兵10815名,占总额一半,以盛京为东北驻防枢纽;其北段,以乌里雅苏台为核心,阿勒泰以东漠北喀尔喀诸部属地,清准几度大战于此,为军事主战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军逾杭爱山突破喀尔喀三部,并劫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帐,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众奔溃,投奔漠南,噶尔丹占据漠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以击追喀尔喀为名,越呼伦池而南,深入至乌兰布通,临近京师七百里,后为清军所败,返回科布多。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再次引兵进驻克鲁伦,拟联合蒙古各部对抗清军。派军萨布素以满洲科尔沁兵出其东,费扬古调陕甘兵出宁夏攻其西,康熙帝亲出独石口,于克鲁伦河并进合击,昭莫多之役歼灭准军主力。是时噶尔丹之伊犁旧地已为僧格之子策妄阿布坦所据,阿尔泰山以西全失,噶尔丹退路断而后亡,所部精锐也消耗略尽,清军遂将喀尔喀三部回迁漠北游牧,并北得科布多,西得哈密,为夹攻准部之根据地。

雍正五年(1727年),噶尔丹策零继位。雍正帝屯兵阿勒泰、巴里坤两处,扼制准军。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出兵征伐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诱清军离科布多大营,于博克托岭、和通泊等处围歼。和通泊之役,清军大败,仅存2000余人退至科布多。噶尔丹策零乘胜进攻北路,深入额尔德尼昭,意欲迎夺喇嘛,掳掠喀尔喀蒙古。次年,清廷调集八旗及蒙古诸部武装,于额尔德尼昭之役,大败准军。其后,双方先以杭爱山为界休战,后划阿勒泰山为分界。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于乌里雅苏台设定边左副将军,其“东界库伦,西界科布多,南界瀚海,北界俄罗斯”,掌管唐努乌梁海和喀尔喀四部及所附额鲁特、辉特二部军政事务。乌里雅苏台虽称边外第一重镇,但设将军却不设重兵,以“皆岁征蒙古兵换房屯牧”^①,以此密切关注蒙古诸部动态,为历次对准用兵的北路集结地,平准后该处将军未撤,直至晚清清廷用兵新疆,乌里雅苏台均为北路要地。乾隆二十六年(1761),随清廷征准大局已定,清廷科布多曾设参赞大臣,强化管理。

^① 魏源:《圣武记》卷3,页104,中华书局,1984年。

2. 中部区域

清代甘肃,北界蒙古,西接新疆,东靠陕西,南临青海,自古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康熙年间,清准虽数次发展,但清廷于甘肃建设临时驻军,用兵后随即撤军。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设置宁夏驻防,拟以此为后方,巩固哈密、巴里坤驻兵,封锁准噶尔。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与准部议和,遂撤巴里坤大军,于哈密驻兵一千,留嘉峪关至哈密之军站以备不虞。吐鲁番回众因惧准部威迫,请徙于内地,内徙者六百五十户,清廷将其安置于肃州境内。随后,吐鲁番头目额敏和卓复率众八千余人内徙于瓜州,自是吐鲁番各城庄空无人矣。清朝遣官赴瓜州,对哈密回众,编旗设佐,置管旗各员。清准和谈数年,虽撤返大军,惟于哈密驻军四千,布隆吉尔驻军五千,杜绝准骑东犯,哈密诸地屯田如故。因吐鲁番头目额敏和卓在“莽噶里克之乱”中深得清廷信任,并助平回部有功,被封郡王。雍正八年,清廷调太原满洲兵三百“前往宁夏驻防”。雍正九年,将西安驻防之江宁、河南满洲兵内调拨一千名,遣往庄浪驻扎^①。雍正十三年,设甘肃凉州八旗满、蒙、汉兵凡二千人。设驻防庄浪八旗满、蒙、汉兵凡千人,甘肃驻防满营经数次征调已初具规模。

雍正末年,双方和谈划界,其北路以阿勒泰山为界,南路以哈密、巴里坤为界,因巴里坤与阿勒泰山东段紧连,且准噶尔袭扰不断。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调部分太原满洲官兵“移驻宁夏”,又调四千八旗官兵,建庄浪、凉州两处驻防,设凉州将军等,使甘肃八旗驻防初具成型。

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大地震,“城尽毁”^②,驻防官兵及家属死亡一千一百一十八人。针对此情,清廷遂筑宁夏新满城,地震之减员兵额,自西安满洲官兵“顶补”。几经征调,宁夏驻防官兵达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合家眷共一万七百三十四人^③,合凉州、庄浪驻防官兵三千二百名,甘肃驻防满营官兵共六千七百余,家眷约两万余众。与此同时,伴随对准战事的需要,及八旗驻防规模的增加,甘肃绿营兵额也随之扩编,形成三标六镇九协一百一十九营,绿营官兵人数达八万二千八百八十八名。

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其中路区域以甘肃为后方,其范围自甘肃宁夏、庄浪、凉州延伸至巴里坤、哈密、吐鲁番新疆东部,该区域驻防于清朝对抗准部作用甚大。其北,清廷将北部蒙古一线驻军为对准用兵之左翼,宁夏、庄浪、凉州一线中部驻军为右翼,两翼官兵为历次清朝对准用兵之主力,实现左右合击,战略合围;其南,中路驻防能隔断西域与青藏的联络,防止蒙藏联合,对清朝的合围;其西,清朝可以于此驻防,有效控辖、笼络哈密、吐鲁番回部,并隔离准噶尔以东商贸联络通道,并集合回、蒙、藏诸部及汉军绿营之力合击准噶尔。相对北部区域清准战事,中部区域驻防较为稳固,虽准军骚扰不断,但双方大战较少,清军未出现似和通泊之役的溃败,究其原因,与绿营屯田的广泛布设,满营、绿营驻防城层层修筑不无关系,使准噶尔游牧式军事方式无法于此发挥优势,此外清廷对于哈密、吐鲁番回部的羁縻联合,对于青藏地区蒙藏族众的拉拢,对孤立准噶尔汗国,分化卫拉特各部,配合军事作战均也效果显著。

3. 南部区域

清朝用兵准噶尔,其南路涉及青海、西藏两地藏教区,双方斗争涉及西藏两派,即拉藏汗与第巴,涉及青海两派,即左翼与右翼,矛盾复杂,关系错综。

十六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于蒙古各部广泛传播,蒙藏之间日益密切。1636年,格鲁派求援卫拉特,顾实汗率卫拉特蒙古四部联军,自伊犁出兵青海,灭却图汗,占领青海,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折返,和硕特部留驻青海。1640年和1642年,顾实汗以格鲁派护教法王身份,于康区和后藏两地,擒杀白利土司和藏巴汗二世,逐步统一青藏高原。格鲁派在和硕特部扶持下成为藏传佛教界统治教派。顺治十一年(1654年),顾实汗病歿拉萨,是时五世达赖影响增强,与和硕特部矛盾日益加剧,其联盟日渐瓦解,西藏第巴实力扩展,与蒙古交恶不断。

噶尔丹完成新疆卫拉特蒙古诸部统一后,遂着手攻打青海和硕特部,对青海进行统一,虽格鲁派上层

① 《清世宗实录》卷108,页427,雍正九年七月庚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③ 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为抗击和硕特,力挺噶尔丹为外援,但噶尔丹占据青海,必将危及西藏宗教集团,西藏派使阻止噶尔丹进兵。加之准噶尔对中亚哈萨克等兼并尚未完成,准噶尔对西藏的进兵较为慎重。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曾举兵欲侵西海^①,但大军行至哈密“回子之地”,引起清朝高度关注,交涉后噶尔丹撤兵而返。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各立达赖而决裂,拉藏汗以清廷为后援,与青海左翼什巴图尔、察罕丹津爆发冲突,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干涉其间。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策妄阿喇布坦兵侵哈密,拟进入青藏,清朝倾力反击。“策妄阿喇布坦,收其遗孽,仅保伊犁。故尝索俘取地,无取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计袭哈密,入西藏。”^②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月,准军绕哈密由阿里出新疆,进入西藏,攻伐拉藏汗。十一月,拉藏汗兵败被杀,清廷遂将用兵重心由新疆移至西藏,出兵救援。然于哈喇乌苏之役,清军损失惨重。

康熙帝对此重新规划战局,军事上调北路阿尔泰一线兵力23400人,中路巴里坤一线兵力17252人,南路青藏区域兵力10000人,胤禩指挥,由三路进军^③,威慑阿勒泰、巴里坤、西藏三线准噶尔大军。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对新疆准噶尔本部围困固守,陈兵青藏交界地带。“自此内至巴里坤,沿途造堡,每堡驻扎兵丁四、五百人固守,大军照常驻扎巴里坤”。政治上宣传“展拓黄教、护送新呼毕勒罕坐床”,认定格桑嘉措为真正达赖转世,深得青海蒙古民心。谴责准军行侵哈密、斩拉藏、毁寺庙不义行径,以蒙古黄教信徒舆论讨伐策妄阿喇布坦,孤立入藏准军。宣称“命我子大将军王率京城之满、蒙大军,遣往西宁,为黄教事会同青海人等议,弘扬黄教,拯救土伯特民,将其作为宗旨,伊等应行即行。”^④,获得青海蒙古和西藏上层支持。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1720年5月),清军南北两路大军入藏,准军畏势循逃。九月十四日(10月15日),北路军进入拉萨,护送新封敕“第六世达赖喇嘛”坐床,次年一月,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贵族和达赖喇嘛等,因惧准噶尔部来年遣兵复来,要求清军酌留驻藏。清廷留清军三千名驻藏在拉萨布达拉宫前河沿筑营十二座,分防紧要关口,清朝直接统治西藏由此开始。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的反乱。雍正帝下诏切责罗布藏丹津,派大兵进剿,并堵截其入藏,罗布藏丹津只身逃往准噶尔部。

清朝于青藏南路的胜利,首要归功对宗教的运用,不信笃武力,“以平靖教务为要事,军旅为小事”,收拾蒙藏民心,并分化准噶尔与青海蒙古,“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⑤。故宗教可为军事之辅助,实现武力之不及,其后新疆八旗驻防实施,清廷尤为重视宗教,并纳入军政体系,宗教遂成为清廷辖控蒙古部众,及驻防官兵的手段之一。

4. 外交领域

中亚大草原自古为我国游牧政权战略后方,常以地理纵深优势,缓解军事不利因素,使中原军事力量难以深入中亚腹地。准噶尔汗国亦如此,雄踞中亚广袤地带,即使三路军事失利,也可退至西路哈萨克草原区域及周边,但随沙俄东扩,准噶尔战略纵深区域大量收缩。清朝为配合用兵准噶尔,以外交联络各政权、部众,实现战略大包围。

遣使沙俄。康熙后期,清朝与沙俄关系处于僵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病逝,雍正三年(1725年),俄彼得大帝逝世,两国随之围绕各自利益开展外交接触。1727年8月,清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1728年双方签订《恰克图条约》,明确清俄中段边界,解决清朝所关注的逃人问题,清俄关系遂趋向缓和,有利对准用兵。雍正八年(1730年)、九年(1731年),清朝祝贺俄皇即位为名两次遣使赴俄,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接见,清朝赢得俄方对平准事宜的支持,解除了沙俄干涉清朝征讨准噶尔的后顾之忧,并

① 西海:位于青海东境,青海湖西岸,原为吐谷浑国都。

② 《清高宗实录》卷499,页276—280,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③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2页,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和硕诚亲王胤祉等奏为办理军务折。

④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4页,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议政大臣巴拜德等奏请阿旺达希入京折。

⑤ 《清圣祖实录》卷286,页790—791,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以通商为筹码,得到战后按《恰克图条约》要求,引渡准噶尔逃人的许诺,进一步孤立了噶尔丹策凌。

联络土尔扈特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6月,清廷曾遣使联络土尔扈特阿玉奇汗,拟说服其东归故地。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为配合出兵准部,再遣使土尔扈特,拟说服土尔扈特东归故地,并联合哈萨克人、布鲁特人自西攻击准噶尔,实现东西夹击的战略构想,但因俄国坚决反对而未能实施。乾隆元年(1736年),清准就以阿尔泰山为界谈判中,噶尔丹策凌提及“现在与土尔扈特绝不来往,与哈萨克、布鲁特并为仇敌,凡准噶尔部人无不以定界和好为乐者。”^①说明准噶尔的衰落,已失去对土尔扈特、哈萨克、布鲁特的控制,并转变为其对立,能够策应清朝对准出兵。乾隆朝出兵准噶尔,是否遣使联络土尔扈特,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交涉哈萨克、布鲁特。清朝平准之前,哈萨克、布鲁特不与其接壤,亦不通使者,清朝拟利用中亚诸部与准噶尔的矛盾,借以牵制准部用兵。哈萨克、布鲁特与准噶尔历史矛盾尖锐,其族众“无不怨之”^②。“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恶,故其附近哈萨克、布鲁特诸部皆相仇仇。”^③康熙帝论及“平定吐鲁番后,招安素尔通等处回子,一面通知哈萨克、布鲁特,不但吐鲁番易取,即策妄阿喇布坦亲来亦可剿灭”^④,雍正帝认为“(准噶尔)其外况有哈萨克、布鲁特与之搆难,设不自顾,悉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断不能获利,何以旋归耶”,可见清朝视哈萨克、布鲁特为牵制准噶尔之有效力量。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准噶尔六千名兵丁,去往哈萨克交战,准噶尔战败,其兵败之处,瞞于其众。”^⑤乾隆二十年(1755年),随准噶尔内讧,清廷得知“巴特玛车凌与哈萨克人众往征达瓦齐之处”,认为“达瓦齐势已穷蹙,准噶尔业成瓦解之形,若不迅速进兵,必致哈萨克幸获其利”,^⑥遂采纳阿睦尔撒纳之策,果断令南北两路大军,利用准部内讧时机,及哈萨克与达瓦齐的矛盾,果断出击达瓦齐。

结 语

清准关系史为清朝历史重要篇章之一,其研究视角有二,即满洲统治者的清朝视角,及中国历史的“大一统”理论视角,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不易混同。准噶尔与满洲同为该时期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于“大一统”体系下具有相同的地位与性质。纵览准噶尔的历史,其统一蒙古、蒙藏的政治目标,统一西北、中亚的军事历程,证明准噶尔与清朝的关系,实为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属性。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历程,亦为杜绝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统一,拆解卫拉特四部联盟的过程,巩固满蒙联,强化清朝统治的过程。其间,清朝逐步消除蒙古诸部的威胁,以八旗、总管旗、盟旗等制度实现“分而治之”,分治蒙古诸部,整合于满洲管理体系下,围绕准噶尔威胁,清朝完成对喀尔喀、青藏、新疆东路的管辖,八旗驻防随之延伸拓展,直至准噶尔政权的覆灭,清朝将疆域推进至巴尔喀什湖西岸,将全部“准部故地”并入版图,清朝版图及八旗驻防格局随之逐步定型。

清朝征服准噶尔前后,清廷于新疆统治政策亦几经变化,征服准噶尔前,拟分封卫拉特四部,实施羁縻政策。征服准噶尔后,于驻军问题中有换防至驻防的转变,于治疆政策方面有直省制与军府制的选择,随其后土尔扈特部等卫拉特诸部回归,清朝继伊犁将军后又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形成“双军府”格局,于官兵选派中有全国军事大调整,各地八旗组建并移驻,清廷将所征服的准噶尔故地称为西域新疆,清朝中央管理新疆序幕由此正式开始。

[责任编辑:奥其]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十一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壬辰。

② 《清圣祖实录》卷263,页593—594,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一,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4—15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264,页597—598,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乾隆五年(1740)十月二十九日,档号:03—1741—1—06。

⑥ 《清高宗实录》卷481,页17,乾隆二十年正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Summary Remarks and Contents

Discoveries and Sorting Out of the Xinjiang Ancient Written Materials Liu Wensuo(003)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ancient written materials hitherto discovered in Xinjiang and to summarize the unearthing and publication circumstances in addition to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progresses made by relevant scholars. The unearthed written materials are in relations to Sino—Tibetan languages, Altaic languages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written on various mediums including stone, wood, bamboo, silk, brick and metals. These written materials,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evidence that demonstrate the old silk roads and the multi—ethnic common home, are reflecting the linguistic case and writing system of the ancient peoples in Xinjiang.

A Re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Court and Jungar Khanate Feng hui(015)

In the studies of Jungar Khanate conducted by the academia today, a continuing adoption of the perspective of Manchu rulers is quite common, resulting in the case that many researches aiming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Court and Jungar Khanate get into a trap, in which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 real grasp of the essence of the question. In this paper, we, shedding light from the angle of “great unification” in China’s history, take an accoun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Jungar Khanate, to expose the real co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Court and Jungar Khanate and to demonstrate Qing conquest of Jungar Khanate, including its strategic target, conquering range and political layout, so as to reveal its impacts on Qing Court defense of Northwest region afterwards.

An Analysis of the Qing Policies to Mongol Domains Led by Khalkha’s Tüsheet Khan

——with a focus on the case of the lands of and subordinates to Princess Kejing

..... Hu Zhe(022)

In the years of its control, Qing Court followed a principle in its policies to the Mongols, by which it gave grace to Mongols on one side while exerted coercion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Dolon Nuur Assembly as mark, the Mongols of Khalkha domains, from the north of Great Gobi, submitted to Qing Court. By then, Kangxi Emperor married his daughter, titled Princess Kejing, to the grandson of Tüsheet Khan, through which he extended the marriage connection policy over to Mongolian noble families in the north of Great Gobi. Differently, however, with other examples of the marriage of Manchu with Mongols, this time the Princess herself was settled in Hohhot, the territory of Tumeds, with her personal properties, including lands, mansion and subordinates, according to the arrangement of Qing Court; instead of leaving for the north of Great Gobi in company with her husband.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Kanxing and his successor, owing to the settlement by Qing Court and thanks to emperor’s grace, Princess Kejing’s family and her domains and subordinates became a heterogeneous force among the Mongols of Tumed in Hohhot, and kept its continuation of independent develop and to expand its land possession and property holdings. But, with the death of the Princess, the powerful existence of her force lost the legal basis. In addition, the l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Mongols of Tumed and the Princess property, caused by structural defects of her domains, finally led a lawsuit of contending lands, in the years of Emperor Qianlong, which in the ends brought abou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rincess domai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clined coercion policy taken by Emperor Qianlong. The land lawsuit case w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Court and Mongol Domains led by Tüsheet Khan, by the use of which,